

新史学

第六卷

历史的生态学解释

本卷主编◎夏明方

中華書局

新史學

第六卷

历史的生态学解释

本卷主编◎夏明方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史学.第6卷,历史的生态学解释:世界与中国/夏明方主
编. -北京:中华书局,2012.5

ISBN 978 - 7 - 101 - 08453 - 5

I. 新… II. 夏… III. ①史学 - 研究②人类生态学 - 研究
- 世界 IV. K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0235 号

书 名 新史学(第六卷):历史的生态学解释:世界与中国

主 编 夏明方

责任编辑 王传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¼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

印 数 1 - 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453 - 5

定 价 60.00 元

导论:历史的生态学解释

——21 世纪中国史学的新革命

夏明方

大约 110 年前,梁任公以其“发聋振聩”的“神来之笔”发出近代中国“新史学的第一声角号”,^①从此打破数千年来几于“陈陈相因,一丘之貉”的“旧史学”,而为“史界辟一新天地”。^②这一新天地,一方面展现出中国史学的“民主化”潮流,^③并从过往的政治史、军事史转向文化史、社会史和经济史,另一方面又处处揭橥科学化的大旗,相继以“进化论”、唯物论或辩证法为指导,将中国史学从所谓“天人合一”的神道史观中剥离出来,专一探讨人间社会的芸芸众生,当可称之为中国史学的“脱魅化”。

不过,在梁任公看来,宇宙间的现象或“事物之变化”,不外“循环”与“进化”两种,前者如四时变迁、天体运行,出自“天然界”,周而复始,一成不变,“可以推算”、“可以试验”,属于研究“空间之现象”的天文学、地理学、物质学、化学等“天然学”的范围;后者则为“历史界”,“其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以其“观察宇宙,则见其生长不已,进步而不知所终,故其体为不完全,且其进步又非一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非逮宇宙之末劫,则历史不能终极”,自当归入“研究时间之现象”的“历史学”的范围。梁还进一步指出,尽管“进化之大理,不独人类为然,即动植物乃至无机世界,亦常有进化者存”,故而“历史

①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 2 卷第 12 期,1949 年 10 月。载桑兵、张凯、於梅舫编:《近代中国学术思想》,中华书局,2008 年,第 413 页。

② 梁启超:《新史学》,《新民丛报》第 1、3、11、14、16、20 号,1902 年 2 月至 11 月,署名“中国之新民”。载桑兵、张凯、於梅舫编:《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第 8 页。

③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 2 卷第 12 期,1949 年 10 月。载桑兵、张凯、於梅舫编:《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第 391—392 页。

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但是人是“进化之极则”,“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故而狭义的历史,“惟以人类为之界”;何况即便是“人类之事实”,也“不能尽纳诸历史”,因为“不过一种之动物”的人类,“其一生一死,固不免于循环;即其日用饮食,言论行事,亦不过大略相等,而无进化之可言”,“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使人人析而独立,则进化终不可期,而历史终不可起”,故所谓“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① 于是,一种原本将人类纳入自然界之“生长”、“演变”与“发展”过程之中的达尔文的生态学思想,在被梁启超引入以“人群”组成的社会之后,又将人类归属的自然界摒弃于历史研究的视野之外,中国史学在超越了旧史学“帝王将相”的藩篱之后,又被框定在人类社会的领域之内,而与所谓“自然”分道扬镳。此后唯物史观的传播和介入,固然将人类的“日用饮食”纳入其研究范围之中,进而视其为社会演进的物质基础,但是所谓的自然界,在当时的历史叙述中,总体而言,还只是被当做人类活动的舞台与背景,隐设在历史的活剧之后。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长期被遮蔽的非人类的自然界力量,终于在中国高歌猛进的现代化大潮中愈益充分地展现了出来,也迅速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从“环境史”这一名词最早传入中国的1987年算起,总共也就二十多年的时间,环境史已经成为中国未来史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新兴领域之一:北京、天津、上海、河北、云南等处高等学府相继成立环境史研究中心,开设研究生课程,甚至将其设为历史学的专门学科纳入招生目录之中;越来越多的学术刊物陆续开辟环境史研究专栏,专门的学术辑刊也有两种,南开大学还建立了“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网站”,各种类型的学术研讨会亦不时举行,国际性学术交流渐趋频繁,专门性的学术成果愈益丰富;就连历史学之外的专家学者也纷纷涉猎,国家环保部则力图借重历史学界的这批新生力量,撰写大部头的通史著作《中国环境史》;与此同时,人们对学科的认识不断深化,趋于成型,大多数学者都不再将其限定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同时视之为历史研究的新视野、新范式,也就是一种“新史学”。一句话,一种以“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环境史学(如后所论,“生态史”的说法更为恰当),已经踏上起飞阶段了。假以时

^① 梁启超:《新史学》,《新民丛报》第1、3、11、14、16、20号,1902年2月至11月,署名“中国之新民”。载桑兵、张凯、於梅舫编:《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第12—14页。

日,被梁启超一分为二的“天”与“人”,“时”与“空”,植物、动物和无机界,以及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终将合而为一,作为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有机整体,构成中国历史的研究对象,进而形成这样的研究据以展开的新视野、新方法,乃至新的世界观和宇宙论,催生出中国史学的新革命。这或许正是梁启超已然提及,但是迅即抛弃的“广义的历史”的真意。

一、从进化史观到辩证史观: 清末民国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透视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环境史研究或其所探讨的主题完全是现时代舶自西方的新事物。只要我们不将这一研究限定在非常严格的范围之内,或者至少从人与非人类自然互动过程的角度来衡量,中国的史学并不乏这样的研究传统。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固然免不了神道主义色彩,毕竟将两者勾连在一起。梁启超的新史学,虽则将人与自然(即“地理”或“地理环境”)区隔开来,但其用进化论来解释人间社会的历史,实际上隐含着两者之间的共通性;在具体的研究中也未曾忽视地理环境与人文现象的关联,相反,正是梁启超开启了后人地关系研究的先河。^①就在《新史学》发表前后,梁撰写了《中国史叙论》、《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以及《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等一系列论文,秉持地理之于人民恰如肉体之于灵魂的“唯物史观”(即“地理唯物论”),从幅员大小、地形分异(高原、平原、海滨等)、气候类型(寒、热、温等)及其空间分布的差异等诸多方面入手,置中国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之下,试图诠释历史时期中国南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区别,探析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以及发达的地方自治制度与强大的君主专制政治数千年并存不悖的根本缘由,同时探讨欧洲诸国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及其对外殖民扩张的物质基础,揭示近代中国

^① 参见王记录:《梁启超论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2期;曹诗图、王衍用:《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地理科学》第15卷第1期,1996年2月。

濒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的主要根源。^① 这一研究趋向,实际上也构成新史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是其所讨论的人地关系,核心则是天人之间的支配与响应关系,属于地理决定论的范畴。后来梁启超渐而认识到,单纯强调不变的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将无法解释同一地域的文化变异现象,于是开始突出人的“心力”对于改造环境、制服“天然”的巨大作用。^② 其后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更是明确地将“自然科学”与“历史事项”截然分开,真正践行了《新史学》提出的“天然”与“历史”互相分离的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梁在探讨人地关系时,还牵涉到另外一个理论基础,即马尔萨斯(时译“玛儿梭士”)人口理论。较早涉及这一主题的是他于光绪二十八年刊发的《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两文,前者将马氏提出的人口过剩或人口压力视为欧美国家走向民族争竞和殖民扩张,进而从“民族国家主义”走向“民族帝国主义”以瓜分全球的主要驱动力,后者则通过对中国夏商周以来数千年间人口统计数据的考察,认为中国数千年来因暴政、战争、瘟疫、饥馑等各种因素的扰乱而“濡滞不进之民数”,使得“玛儿梭士人口论之公例独不行于中国”,故此“泰西历史为进化,我国历史为循环,岂必论他事,即户口一端而已然矣”。^③ 借助于马尔萨斯理论,梁实际上将曾经从中获得灵感的达尔文学说运用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政治体系。其后是1904、1907年《东方杂志》先后刊发的社论《中国之乱由于人口之众寡》、《论中国治乱与人口之关系》,^④两文与梁启超的非马尔萨斯论唱起反调,将中国几千年来周期性发生的王朝兴衰与人口过剩联系起来,认为中国总是深陷马尔萨斯困境,不能自拔,而西方的成功恰在于对这一困境的超越。这一改变对此后的人地关系研究影响深远,迄今仍为中国史界争论不休的话题。^⑤

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则独辟蹊径,直接将西方的生物学理论运用于中国

①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饮冰室文集之六、之十。中华书局,1988年。

②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民国十三年。见《饮冰室合集》第五册,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8年。

③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饮冰室文集之十。

④ 两文分见《东方杂志》1904年第6期,转《警钟报》;1907年第7期。

⑤ 朱友渔于191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慈善的精神》,大约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系统引入中国历史的作品。

社会、历史的分析。他把明恩溥的《中国人特性》、亨丁顿《种族之特性》一书中讨论中国灾荒与国民特性的篇章,^①与西方优生学糅合在一起,纂成《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颇为系统地探讨了“生物的遗传、地理的环境与文化的遗业”三因素之间的“动的关系”及其在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交光互影的影响”,并喻之为等边的“生命的三角”,其中遗传是基础,是底线,环境、文化是边线,对遗传的力量发挥选择与淘汰的作用,三者相互作用,共同促成文化遗传的发达与衰退或民族的兴亡。^② 潘认为,人们用以解释文化演化的方法不外三种,即“文化的地理学观或自然环境观”、“文化的文化学观”以及“文化的生物学观”或“生物学解释”,前一种对应于文化金字塔的最底层“理化现象”,最后一种对应于“有机现象”或“生物学现象”,第二种史观则对应于塔的上层“心理现象”、“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但是在潘光旦看来,用“心理现象”、“社会现象”来解释文化,往往聚焦于“人力的支配”,“比较要缺少基本性与固定性”,难以持久,而“理化的现象自然是最基本的了,但是他们比较的最不受人力的左右,寒带的奇冷、热带的酷热、日本的地震、中国西北方的沙漠化,是绝对没有多大的办法的,人类生活只有迁就他们,很难教他们来迁就人类”,因此,“在一切现象之中,能够比较受人力的转移的,同时也具有充分的基本性的,是生物学的现象”。这种生物现象决定了“民品的良窳”或“人才的消长”,进而决定了“文化盛衰”。但是这种智力或民品并不能通过后天获得性遗传而承继或累积下去,只有通过“突变”或“选择”,鉴于前者对于人类来说“不易捉摸”,故潘光旦把眼光放到“选择”之上,在他看来,这种选择对于遗传的本质所引起的变动,“不是品性的质地上的掉换,而是各个品性在人口中数量上前后不同的支配”,而无论是自然界的势力(自然选择或自然淘汰),还是社会与文化的种种势力(文化选择或人文选择),都可以使人类的“死亡率、婚姻率和生产率发生轩轻的局面”,结果就会引起不同品性在人口中的比例发生变化,进而导致文化的变异。人口的死亡、婚姻、生产以及移植即成为人类遗传品性之选择的途径或支点。^③

① 亨丁顿著,潘光旦译:《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新月书店,1929年。

② 参见潘光旦著:《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7—29页。

③ 潘光旦:《文化的生物学观》,载氏著《人文史观》,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25页。

中国不幸由于北方和西北方的气候风土情形而导致“荒年太多”，又每每引起人口大范围的移植，以致“吃了大亏”，形成不同于西方的“逆淘汰”或“反淘汰”，人口品性日趋羸劣，因此，“如何变通现存的种种文化势力，使中华民族中比较优秀的分子可以取得婚姻与生产的保障或两者的效率的提高”，将是中华民族走向健康、卫生的复兴之路必须解决的问题。^①

有意思的是，尽管潘光旦特别强调生物学视野在历史和社会学研究中的作用，也因其对遗传因素的强调、对女性的歧视等，曾在民国学界引起激烈的争论，屡遭非议，但他还是自始至终坚持己见，并把自己的研究称为“人文史观”。明确打出“生物史观”的旗号，并试图对当时中国的历史观或历史哲学进行全面重构的，是近年来方才引起一部分大陆学者关注的历史哲学家常乃德。^② 与潘光旦注重生物个体品性的不变的遗传特性不同，常乃德再进一步，将整个人类社会均视同生物，亦即不再把生物看做外在于社会、文化的外部动力，而是将社会、文化都纳入到生物的，乃至宇宙的范围之中，认为“社会也是一个生物，也是一个独立完整生命”，人成了生物界的一部分；如此一来，创造历史的主体不仅包含人，也包括人之外的生物。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与他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以及怀特海过程哲学中获取的灵感分不开的，这就是以关系论取代物质论，对宇宙的演化形式持“层创进化”观点。他认为，仅有物质概念并不能解释事物的变化，必须加上“组织”观念，才能对新物质的形成做出圆满的解释，这实际上指的是今日复杂性理论所说的“涌现”现象。这样一种“新宇宙观念”，是常乃德将自己的研究看得高于其他一切史观——如“唯神史观”、“唯理史观”、“地理史观”、“种族史观”和“经济史观”（即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相应地，他主张以社会有机体论取代社会原子论，打通人与生物体之间的界限，因为在他看来，尽管人类个体是生物演化最高阶段的产物，但是社会却不仅为人类所独有，同样也存在于低等生物世界，个体如果脱离群体与社会，将难以应对生存竞争的残酷局面。不过，这种宇宙观、社会观的“大转变”，在怀特海那里，是对

① 潘光旦：《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载氏著《人文史观》，第215—243页。

② 有关常燕生（一名常乃德）的史学思想，可参见黄敏兰：《学术救国——知识分子历史观与中国政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顾有谷：《常乃德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朱慈恩：《常乃德历史哲学述论》，《晋阳学刊》2008年第1期。

现代科学的质疑和反思,也颇接近于欧美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深层生态学思潮,然而在常的笔下则变成了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重新论证,或者如他自己所言,是对后者最系统的运用。他认为,既然社会是由生物关系所决定,也必然遵循生物学的法则,即血缘关系大于经济关系,社会集团的利益大于部分利益,人类社会亦因之按照家庭、宗族、部族、国族四个阶段向前演化,其根本动力即为“国族性”。^①遗憾的是,他打通了社会与生物之间的界限,却维持着无机界与有机界的区别,特别是人与其他一切生物的区别,并把社会演化的道路看做是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而且与上面所谈的对于历史的地理学、人口学、优生学解释一样,他对自然因素的重视,实际上只是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最新发现挪用到人类社会而已,以致最终踏上他所批评的唯心主义的道路,自然本身反而随着理论的演进而退隐于后了。时代的变动既推进又束缚了人们对于历史与自然的思索,使得我们很难把它们与对现代化进行反思的环境史研究径直划等号,但无论如何,它们也都是今日正在遭遇现代大转型的环境史学者需要进一步深入发掘的思想遗产。

当然,这一时期并不缺乏对诸如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人对自然界的影响此类问题所展开的思索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样的研究成为今日环境史最直接的学术渊源。至迟在 1920 年代,(姚)存吾即刊文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突出人对自然的影响,并力图把空间纳入到时间之中,揭示其发生的变化,但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其论述主要是为征服自然的现代科学大唱赞歌,因为这种在人力作用下变化了的环境主要是人文景观,或者用生态学术语来说,是人工环境,是第二自然。^②真正注意到环境自身的变化,并从这一角度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当属竺可桢 1925 年开始的气候变迁研究。这一年,他连续发表四篇文章,即《南宋时代我国气候学之揣测》、《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日中黑子与世界气候》和《中国历史上之旱灾》,^③后又续发《中国历史上气候之脉动现象》(1926)、《直隶地理的环境和水灾》

① 参见常燕生:《生物史观研究》,《山西民众教育》第 3 卷第 3 期,1936 年;《生物史观与唯物史观的比较》,《国论》第 2 卷第 6 期,1937 年。

② 存吾:《从历史上观察地理变迁与人生之关系》,《地学杂志》第 119 号,第 120 号,1920 年。

③ 分见《科学》第 10 卷第 2 期;《东方杂志》第 22 卷第 3 期;《科学》第 10 卷第 6 期;《史地学报》第 3 卷第 6 期。

(1927)、《天时对于战争之影响》(1932)、《华北之干旱及其前因后果》(1934)等,^①开创性地运用大量丰富的历史资料来揭示中国气候冷暖干湿方面的周期性波动,并从天文、气候、地形、地质以及人口与农业等“人为的环境”探讨灾害形成的原因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大体上显现出“地球表面的岩石圈、水圈、气圈、人类的相互作用”的轮廓,初步奠定了中国历史气候研究的理论框架。蒙文通、徐中舒、郑子政、丁文江、胡厚宣等学者,则将这样的研究拓展到考古学、历史学等领域。^②

至于唯物史观,在最初的传播、流行过程中,的确因其聚焦于“经济基础”在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而对自然本身的思考着墨不多,但也不是像常乃德所批评的那样不过是“机械的辩证法”,甚至带有玄学的特质。1930年代李长傅对威特福格尔相关学术观点的系列译介和述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一方面的艰苦探索之功,也代表了当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较高认知水准。这些述评回溯了近世以来国外地理学方法论演进的四个阶段,即记载地理学、自然偏重论(即地理的唯物论)、技术论和人地关系论(即人地交互作用论),认为记载的地理学还只是“地理资料,充其量不过年鉴,还不得称为地理学”;自然偏重论主张“一切地理现象都受自然支配”,采取“罗列方法”和“速成的推论法”,将气候、土地、自然环境等“地理的要因”“无秩序的并列着”,并与人类的事项简单对应,“把自然的契机,估价太为高了”,以为“自然支配人类”,属于“机械的唯物论”;“技术论”者则把人类看做“万物之灵”,看做支配一切自然的主人,认为人类可以“渐次脱去自然影响,从自然取向解放”,从而陷于一种片面的“解放观”,“退返于机械的观念论”;19世纪以来兴起的“人地关系论”显然“进了一步”,即将自然与

① 分见美国《地理季刊》(*Geographical Review*)1926年4月;《科学》第12卷第12期,1927年;《科学》第16卷第12期,1932年;《地理学报》第1卷第2期,1934年12月。参见《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宋正海、孙关龙、艾素珍主编:《历史自然学的理论与实践:天地生人综合研究论文集》,学苑出版社,1994年。

② 参见蒙文通:《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史学杂志》第2卷第3—4期,1930年。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1930年第1期,第60—75页;郑子政:《二百年来北平之气候》,见中央研究院《廿一年度总报告》;《树木年轮与北平雨量》,《方志月刊》第8卷第6期,1935年6月;《探求古代气候之一途径——树木年轮之研究》,《气象杂志》第11卷第3期,1935年。丁文江:《陕西省水旱灾之记录与中国西北部干旱化之假说》,《地理杂志》第9卷第2期,1936年,第98—104页;胡厚宣:《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4年第4卷,上,第1—83页。

人类看做是“同质同权”，“一方面自然支配人生，一方面人类也利用自然，而行其交互作用”，但是也如同自然偏重论那样，主要采取“速成的推论法，使人与地直接发生关系，漏去了中间项最重要的媒介物劳动过程”，因而也属于“机械的唯物论”；只有“辩证法的唯物论”才是“最正确的地理方法”。依据最后一种方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解说，自然与人类并不是一种“严密对立”的关系，人类其实是“自然之一部分”，“他的劳作无论肉体的，精神的，同为生理的过程，又是自然的过程”，也“并不废弃原料的自然性质，只有变其形，不过变为与自己生活有益之形而已”。这是其一。其二，自然与人类之间并不“直接发生关系”，而是以劳动过程为媒介，“才在人类之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这样的活动，“不是个人的，而是联络多数的人所行的社会活动”，它既包括人类对自然的活动，也包括人类对人类的活动，前者构成人类对自然的“生产力”，后者则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两者互相关联，“成为社会政治一切的基础”。因此，“一切人文地理的现象，其主动力不在自然，不在人类，而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其三，自然本身也不是固定不动的，“自然与社会之界限，是不定而流通的”，因为通过劳动过程，人类一方面“改变了他以外的自然，同时也使自身的性质发生变化”。据李长傅的归纳，魏特夫将自然的变化分为两类，一是因人类生产劳动而导致的自然环境物理方面的变化，即“自然变形”，一是指随着人类社会劳动过程的演进而导致自然的特定部分及其特定性质相对于人类社会所发生的变化——“现实化”或“非现实化”，即客观的自然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其本身在社会的与劳动人类之关系之意义上，营不断的辩证法的转换而已”。魏特夫称之为“相对变化”。如此，自然环境的种种变化，就不是“物理的自然，而是辩证法的自然”，因而也就是“历史的自然”，自然本身成为历史的一部分。^① 这种

① 参见李长傅：《地理学研究的新阶段——温特福格尔氏学说之介绍》，《地学季刊》第2卷第1期，1935年；《地理学研究的新阶段（续）——经济地理学方法论》，《地学季刊》第2卷第2期，1935年；《科学的地理学之新转向》，《地学季刊》第2卷第3期，1935年；《转型期的地理学浅释》，《地学季刊》第2卷第4期，1935年；《自然环境之真义——历史的自然之研究》，《地学季刊》第2卷第4期，1935年；《经济地理学之新阶段》，《中国经济》第3卷第5期，1935年。均载氏著：《李长傅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按：本书先后出现的“威特福格尔”、“魏特夫”、“温特福格尔”均指同一学者。沃斯特曾经将美国环境史的学术之源与魏特夫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早在1930年代，他的思想就对中国学界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论述与常乃德的关系论和组织论异曲同工。由此看来,从神秘的“天道”到物质的“地理”,从不变的“地理环境”到变动的“自然环境”,从人口、遗传、生物到无机界,人与自然之间终于在劳动过程中连接在一起,甚至偶尔还会出现“农民生态”和“生态史”这样的提法,^①所有这些都表明,经过多年来对史学方法论的探讨与争鸣,近世学者对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正在形成巨大的飞跃。

二、隐蔽的“恩格斯路线”及其复兴:

20 世纪下半叶环境史的顿挫与崛起

建国以后,由于斯大林的“地理环境不变论”开始主导中国地理学界和历史学界,历史的地理学、生物学解释传统几乎变成了过街之鼠。1950 年代,地理学界曾经专门“学习斯大林同志的论点”,而将以人地关系为核心的人文地理学宣判为“伪科学”;^②李长傅的地理研究虽然仍坚持人在环境变化中的作用,其理论依据却一变而为斯大林的论述;^③同样,潘光旦的“人文史观”、常乃德的“生物史观”以及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史观”等,均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激烈批判。^④不过,在地理学特别是历史地理学领域,由竺可桢开创的地理环境变迁研究不仅未曾中断,反而成就斐然,名家辈出,其杰出代表即是众所周知的侯仁之、谭其骧、徐近之、岑仲勉、史念海、文焕然、陈桥驿、邹逸麟等。^⑤1959 年,文焕然出版

① 惠迪人:《农民生态及其未来趋势》,1947 年 3 月 8 日定稿,《农村月刊》第 1 卷第 4 期,第 13—15 页。不过尽管作者号称研究生态学多年,对中国农村问题特别关注,但文中对生态史的理解,或者对农村历史的演进所做的阐述,主要是用来论证农村近代化的必要,强调人兽之别,与今日大异其趣。

② 参见王铮:《1979 年以来中国的人地关系研究》,《人文地理》第 11 卷增刊,1996 年 12 月。

③ 参见李长傅:《辩证唯物论与地理学》,《新地理之友》第 1 集,1951 年。见《李长傅文集》,第 52—60 页。

④ 参见胡绳:《社会历史研究怎样成为科学》,《历史研究》1956 年第 11 期。对“人口史观”的批判,早在解放前夕就开始了。参见吴泽:《人口问题与人口史观批判》,《中国建设》第 8 卷第 1 期,1949 年 4 月。

⑤ 他们的成果,环境史学界已耳熟能详,恕不罗列。可参见华林甫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2002 年。

了“建国以来第一本研究历史气候变迁的专著”，即《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商务印书馆)，其后又与何业恒等学者合作，在野生珍稀动物和森林植被分布变迁领域“做了开创性的工作”。^① 1972年，竺可桢完成了中国气候历史领域的奠基性著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② 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在竺可桢的领导和组织之下，历史地理学的同行汇聚一起，共同编撰《中国自然地理》分册《历史自然地理》，并于“文革”结束之初完稿，堪为过往学界对于历史时期中国气候、植被、水系、海岸以及沙漠变迁研究方面的总结性成果。在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的主持之下，全国各气象局及相关高校、科研机构共三十多个单位，也于1970年代初开始，对华北、西北、西南、华东、华南等省近五百年旱涝气候史料进行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并于1979年绘制完成《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地图出版社，1981年)，迄今仍是中国气候变化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数据。

这些研究不仅留意于历史考证，亦注重走出书斋，走向野外，将文献检索与实地考察结合起来，且充分利用氧同位素、树木年轮、孢子花粉等现代科学技术分析手段；这样的研究，也不只是去尽力发现纯粹的自然变化，实际上更关注人的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而且也不仅仅埋首于具体而微的个案研究，而是在地理学方法论上对传统或主流观点进行公开的质疑与讨论。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侯仁之了。早在1950年，他就撰文对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学科进行质疑，要求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包括史前时期开始“每一时期中自然与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界动物的生灭移徙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废等”。继而又于1959、1962、1973和1979年多次阐述自己的主张。^③ 他不仅坚持自然界的观念，还突出了人在变化中的作用；为此还区分了两者的变化，一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现代地理环境在全新世开始之前早已经历的“剧烈的造山登陆运

① 邹逸麟语。参见文焕然等著，文榕生选编整理：《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2006年重排增补本，“邹序”。

② 文见《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中国科学》1972年第2期。

③ 参见侯仁之著：《历史地理学的视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34页。

动”，一是当前地表形态基本形成之后地表上普遍存在着的“精雕细刻”的地貌塑造过程、局部地区的新构造运动以及气候上的长期脉动等等，我们可以用“地质巨变”与“地形微变”概括之，在他看来，后一种变化，除了像火山、地震、山崩、海啸等突发性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自然环境的局部性变化外，在人类历史时期总体上是“比较小的，也比较少的”，只有“人加工于自然从而引起的大地面貌的改观”才是这一时期自然变化最主要的动力；而“人之加工于自然，不是单独的个人行径，而是通过彼此间的一定关系才得实现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是在人与自然进行生产斗争中所结成的一种关系”，如果“否定生产关系的存在，而企图理解这些地理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实际是不可能的”。^①很显然，尽管侯仁之力主将历史地理从沿革地理学中解脱出来，把它划入自然科学的范畴，但并不缺少对人、对社会以及人、社会与自然之相互关系的关注。这些论述，当然带有那一时代所烙下的意识形态色彩，亦即把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看做是解决人与自然矛盾与冲突的最佳制度，认为这样的制度已经使中国人民“逐步展开了有计划地、自觉地和全面地改造自然并利用自然的新时代”，^②但无疑是出于一种信仰，即只有社会主义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才会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并存。当然，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他的主张，深受 20 世纪 30 至 70 年代英国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奠基者和建设者克利福德·达比的影响，但在阐述自己观点时，又每每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寻找理论的依据，主张以“辩证唯物论”取代“机械唯物论”，属于典型的“恩格斯路线”。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当时历史地理学界大部分同仁的共识。陈桥驿、王守春在为《历史自然地理》撰写的总论中，即曾明确指出，地理环境在历史时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其中一方面是自然界本身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和改造，而且愈来愈广泛地改变了自然界的力量，“成为地理环境变迁的主导力量”；他们还认为，地理环境各组成部分的变迁，并不彼此孤立，而是相互影响，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其变迁过程，也不是一种直线发展的简单形式，而是“十分曲折”，甚至“反复交替”。因此，他们笔下的“地理环境”，已经超越了民国时期习用的定义，成为一个“由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

① 参见侯仁之著：《历史地理学的视野》，第 17—34 页。

② 参见侯仁之著：《历史地理学的视野》，第 26—27 页。

生活于其中的植物、动物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物质体系”。^①人固然被认为处于这一物质体系之外,但已经与后者形成密不可分的关联了。

也有个别从事生态学研究 and 教学的学者,如兰州大学王勋陵,自 70 年代初期开始,即始终不懈地运用生态学理论探讨中国历史时期的生态意识,尤其是中国古代在生态学、进化论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及其在科学史上的意义。改革开放以后,更是陆续发表论文,系统地论述中国古代的生态学理论,追索中国古代在保护自然环境和利用生物资源上的经验教训。^②先前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亦呈现出“环境学化”、“生态化”的趋势。1982 年 9 月 25 日,北京大学夏凌甚至提出“历史生态学”的概念,主张“以历史时期(新石器以后)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这一关系的本质特征以及这一关系在历史时期演变的规律性”。^③虽然这一提法并没有被北大的历史地理学同行所接受,但是鉴于“环境污染以及生态平衡不断遭受明显破坏的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而这些问题“都是人类不恰当的活动在自然界中所引起的结果”,故而以侯仁之为代表的一批北京学者,主要是“地学——包括第四纪地质、古地理、历史地理、历史气候的工作者和历史考古学的工作者”,“自愿组织‘北京环境变迁研究会’,希冀对全新世开始以来这一万年间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自然和人文的环境变迁,先进行专题研究”,除了探讨、认识“自然界本身变化的规律”之外,“更需要去探讨人类在历史上对于自然界进行干预的经验和教训”。^④其研究成果陆续

①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 年,序及总论。

② 王勋陵:《试论我国古代的生态地植物学》(1970 年代初期,未刊);《从〈齐民要术〉看贾思勰的农家思想》,《甘肃日报》1975 年 2 月 21 日;《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植物生态学上的贡献》,《我国古代在环境问题上的斗争》,1977 年安徽合肥“第二届中国生物学史研讨会”会议论文;《试论我国古代天地人的统一思想》,1981 年;《试论天地人统一的思想》,《生态学》1982 年第 3 期;《我国古代的生态学思想及有关记载的探讨》,《西北大学学报》1984 年第 1 期;《我国古代在保护自然环境及利用生物资源上的经验教训》,《环境研究》1985 年第 1 期。另有《甘肃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历史考察》,《环境研究》1983 年第 3 期,第 43—44 页;《历史上甘肃环境变化的教训》,《环境科学》1985 年第 2 期,第 46—66 页。参见张正春、王勋陵、安黎哲著:《中国生态学》,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 年,序言第 1—2 页,第 16 页;第 389—391 页。

③ 夏凌:《我对于历史生态学的思考》,《生态学杂志》1983 年第 2 期。

④ 侯仁之:《〈环境变迁研究〉发刊词》,1983 年 8 月 30 日。载侯仁之主编:《环境变迁研究》第一辑,海洋出版社,1984 年,第 1—5 页。

发表于1984年出版的《环境变迁研究》辑刊上。这实际上与1980年代初期中国地理学界“重振人文地理学”、复兴人地关系研究的思潮息息相关。^①与此同时,北大地学楼还成为另一学派的诞生地,这就是以1982年“张衡学社”成立为标志的历史自然学或历史灾害学派,他们非常明确地将其倡导的“天地生人”的研究与历史地理学区别开来,更强调其自然科学特性,具有浓厚的“非人文化倾向”,^②但也把我们带进了更加广阔的宇宙之中,毕竟作为生物体的“人”,真正成为天地巨系统的一员。^③从事生态学研究 and 环境保护工作的学者、官员,则主要从学科建设或现实需要出发,倡导“将环境的历史研究同现状研究结合起来”,“探索环境演化的规律”,“揭示人类活动同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变化对人类生存的影响”。^④1984年成稿的《中国环境保护史话》,就是在著名生态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环境科学委员会主任的马世骏教授和国家环保局副局长金鉴明的鼓励和支持下撰写的,马在序言中特别倡导要加强对“中国环境问题发展史”的研究。^⑤尽管海外中国环境史的先驱者伊懋可认为该书不过是以传统资料对环境变化进行描述,是“资料的剪贴集”,^⑥但从中国的学术语境来看,毕竟迈出了新的可贵的一步。王伟杰等编著,1988年出版的《北京环境史话》,则提出“古环境学”概念,建议研究一切与历史时期有关的“环境要素”,如城市或居落(主要指人口数量及其所从事的活动对环境的污染)、水系、土壤、大气污染、气候变化、植被、动物、园林与矿产开发等,先把它们“综合起来,总结出某一历史时期的环境特征(相当于历史学上的断代史),然后再把它们纵贯起来,就得出某一地区环境变化的通史,即古环境史,从而阐明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和人类

① 参见王铮:《1979年以来中国的人地关系研究》,《人文地理》第11卷增刊,1996年12月。

② 夏明方:《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梅雪芹将笔者的这一论断推广到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似不甚妥当。见氏著《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史学月刊》2009年第6期。

③ 宋正海、孙关龙、艾素珍主编:《历史自然学的理论与实践——天地生人综合研究论文集》,学苑出版社,1994年。

④ 这一建议较早的表述见于1983年公开发行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环境科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转引自宋豫秦等著:《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页。

⑤ 袁清林编著:《中国环境保护史话》,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1988年马世骏“序”及编者“前言”。该出版社同年亦出版严足仁编《中国历代环境保护法制》。

⑥ 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6月刊行,第19页。